

September 2013

How Can A Literary Theory Be in the Era of Post Theories?

Wei So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Song, Wei. 2013. "How Can A Literary Theory Be in the Era of Post Theories?."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3, (5): pp.130-134.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3/iss5/10>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如何可能

宋 伟

摘 要:伴随当代思想方式、思维方式以及言说方式的变革或转型,现代性理论范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危机,“后理论”或“理论之后”等议题成为学术反思的前沿热点问题。从批判理论的视域看,“后理论”应该是一种具有解构批判精神的后现代性理论范式。“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重构,不仅仅是当代文化急剧变化的一种回应,它更是一种批判性的质疑。因此,现实关切和批判向度成为当代文学理论重构所亟待解决的文化政治议题。

关键词:后理论 后现代性 后形而上学 文学理论重构

作者简介:宋伟,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美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电子邮箱:songyiwei61@126.com 本文系辽宁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基础理论研究课题:“社会转型语境中的文学批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How Can A Literary Theory Be in the Era of Post Theories?

Abstract: Theoretical paradigm of modernity is met with unprecedented challenge and crisis, amid contemporary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oughts, thinking and discourse. Issues emerging from the post theory and “after theory” become important points for academic reflection. Post theories belong to the theoretical paradigm of postmodernity with a deconstructionist critical spirit. The re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theory in the era of post theories is not only a response and a critical questioning to contemporary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reality concern and critical dimension are the most demanding cultural – political issues in the process of the reconstruction.

Key words: post theories postmodernity post – metaphysics re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theory

Author: Song Wei is a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China), with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in aesthetics, literary theory, and cultural study. Email: songyiwei61@126.com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今时代的文化思想已经进入“后”时期。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情形是,“后”(post-)这一极具前沿色彩的词缀,不断地附着于诸多传统概念之上,发动起一场又一场的词语偷袭战,颠覆瓦解了一系列语词的传统意涵。后现代主义、后形而上学、后哲学文化、后工业社会、后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传统概念或关键词,似乎都无法逃脱“后”的词语偷袭。上述情形表明,当代思想方式、思维方式以及言说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或转型。或许,从理论层面上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判断:后理论时代来临,当代理论研究进入“后理论时代”,“后理论”或“理论之后”等问题业已成为学术反思的时代性议题。因而,将当代文学理论所面临的问题,表述或理解为“‘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如何可

能”的前提性追问,成为反思及重构当代文学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后现代语境中的“后理论”

显而易见,“后理论时代”的指认源自于当代理论所面临的挑战与危机,其实质关乎于理论的当代转型及其未来走向,而这一问题的提出可谓由来已久,并成为涉及不同学科领域理论重构的国际性前沿课题。2003年,在国际人文学科领域影响广泛的美国理论杂志《批评探索》,以当代理论危机为探索焦点,汇集不同学科领域的著名学者,展开了一场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其核心议题为:理论的辉煌时期是否已成为过去?理论是否

已丧失了其革命的可能性?在压倒一切的大众文化和商业娱乐的大潮中文学和美学的命运如何?信息和生物技术革命能否为政治、科学、艺术和宗教等领域的理论探索开辟新的途径?以及知识传播的媒介和形式能否为理论带来新的变化等等。在这些核心议题中,“后理论”问题凸显出来,引起西方文学理论界的高度关注。针对理论危机所引发的诸种问题,拉曼·赛尔登等在修订影响广泛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2005年版)时,特别增补了“后理论”的相关论述,并将其作为全书的最后章节。在他们看来:“一批论著的标题告诉我们,一个新的‘理论的终结’,或者说得模糊一点,一个‘后理论’转向的时代开始了。于是,我们读到了民连京·卡宁汉的《理论之后的读解》(2002)、让-米歇尔·拉巴耳特的《理论的未来》(2002)、特里·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2003)以及《后理论:批评的新方向》(1999)、《理论还剩下什么?》(2000)、《生活:理论之后》(2005)等文集。且不论我们能不能有意义地进入‘后理论’,我们最终发现,这一预告更像是在重定方向,而不像一个戏剧性的启示录”(326)。应该说,拉曼·赛尔登等学者将“后理论”作为新版教科书的“结语”,具有明显的预示或展望未来理论走向的意涵。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当代文学理论已经迎来了“后理论时代的来临”。

在一系列关于理论危机以及“后理论”等问题的论争探索中,尽管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和相异的观点,但对于理论危机这一议题的基本共识是:一方面,表明理论必须面对时代发展变化的挑战,在时代的转型变革中寻求自身的转向;另一方面,表明在急剧变化的时代,理论不仅不会变得无足轻重,以至于最后走向终结或死亡,反而会越发凸显其重要的意义与价值。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寻找一种新的理论范式,使之有效地阐释当今时代的发展变化。

当我们用“后理论时代”指认当今时代的理论状况时,应大致包含如下几层意思:首先,是指理论的终结或理论的死亡。需要指出的是,理解“理论的终结或死亡”这一表述,不应简单地流于命题的浅表含义,也就是说,这一命题的精神实质和理论诉求在于宣告传统理论的终结或死亡,其矛头直指传统理论,而绝非宣告“所有理论”的终结或死亡。在这里,“后”体现为一种与传统断然

决裂的理论姿态或立场。其次,是指与传统理论不同或异质的当代理论的生成。如果“理论的终结或死亡”意在表明一种与传统理论决裂的理论姿态,而非宣告所有理论的终结,甚至主张退回到“前理论”的原始天真状态,那么,“后理论”所欲图寻求或重构的则是一种能够应对当代世界变化并有效地予以阐释和批判的新的理论范式,其最为突显的特征在于,它试图在强化与传统的断裂中寻求一种新的理论形态的重构。三是指后现代性理论。显然,无论是“后理论时代”的命名,抑或是“理论之后”的表述,无不凸显出“后”这一词语概念的丰富内涵,并与“后现代性理论”或“后现代性思想”构成了内在的谱系关联。更由于,伴随“后现代性”理论思潮的广泛传播与影响,后现代主义已经形成成为独具特色的异质性的理论范式,并建构起一系列有别于传统的思想方式、问题框架和概念星丛。因此,就其精神实质而言,“后现代性理论”也是一种“后理论”;反之,也可以说“后理论”就应该是“后现代性理论”。当然,上述三个层面始终相互交织渗透在一起,无法剥离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然而,无论从哪个层面来理解“后理论”这一概念,“后理论”这一称谓的出现就已经明确地向人们表明,“理论”在当今时代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与挑战,同时也显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与生机。这就要求理论自身应该不断地去追求变革与转型,以获得应对急剧变化时代的阐释能力与批判向度。

虽然,后现代主义还是一个存有广泛争议的话题,在此,我们依然倾向于将“后理论”理解为后现代视域中的理论状况,并将“后理论”指认为一种后现代性的理论范式。其理由在于,“后现代”无疑是诸多“后”之中最具代表性、涵盖性的指称概念,它可以而且能够更准确地表征当今时代的谱系特征。进而,后现代在表征当今时代谱系特征的同时,亦同样表征着当代文化范式、思想范式和理论范式的谱系特征。正如贝斯特和凯尔纳所说:“我们把这个在社会生活、艺术、科学、哲学与理论方面的剧烈变化称为‘后现代转向’,并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位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新的和基本上是未知的领地。后现代转向包括从现代到后现代众多领域理论的一种变化,此变化指向一种考察世界、解释世界的新范式”(《后现代转向》3)。

在此,需要关注的重点是,我们应该在何种意义上理解“后现代”以及“后理论”的概念,并阐释其特定的理论意涵。

以伊格尔顿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理论终结”或“理论之后”论域中的“理论”有其特定的指涉,即指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盛行于欧美并播撒世界各地的后现代理论。因而,他们所说的“后理论”,不仅不属于后现代性思想谱系之列,反倒是其必须告别或终结的对象。也就是说,“理论终结”或“理论之后”等议题的提出,实质上表达了一些理论家对后结构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等后现代性理论话语的质疑和不满,并以此宣告其进入终结阶段。在《理论之后》一书中,伊格尔顿开宗明义地宣称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消失,他以其一贯擅长的讥讽语气写到:“雅克·拉康、列维·施特劳斯、阿尔都塞、巴特、福柯的开创性著作远离我们有了几十年。R·威廉斯、L·伊利格瑞、皮埃尔·布迪厄、朱丽娅·克里斯蒂娃、雅克·德里达、H·西克苏、F·杰姆逊、E·赛义德早期的开创性著作也成明日黄花。从那时起可与那些开山鼻祖的雄心大志和新颖独创相颉颃的著作寥寥无几。他们有些人已经倒下。命运使得罗兰·巴特丧生于巴黎的洗衣货车之下,让米歇尔·福柯感染了艾滋,命运召回了拉康、威廉斯、布迪厄,并把路易·阿尔都塞因谋杀妻子打发进了精神病院。看来,上帝并非结构主义者”(3)。我们看到,伊格尔顿试图站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后现代主义以及当代文化研究理论予以全面的驳斥,正如他曾持同样的立场驳斥德里达的“解构的马克思主义”一样。因而,他所说的“理论之后”乃是对一直以来盛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强力反拨,其具体指涉的是以福柯、德里达、拉康等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等后现代性思想谱系。在伊格尔顿看来,后现代性理论话语不过是一种犬儒主义的当代变体,其激进姿态背后隐含着政治的退却或绝望。针对后现代主义消解宏大叙事的多元差异理论,伊格尔顿主张恢复宏大叙事的传统理论范式。如此说来,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实质在于,借宣告后现代主义全面失效之机,重新恢复传统理论或正统理论的合法性地位。且不说伊格尔顿一直以来对后现代主义所持的冷嘲热讽、全面拒斥态度有多少可疑之处,单就“理论之后”议题的“理论化”

反思来说,《理论之后》几乎很少涉及理论范式转换的重要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伊格尔顿只不过在借题发挥,并以此宣泄对后现代主义的强烈不满。

值得注意的是,伊格尔顿的观点对中国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国内某些关注“后理论”问题的学者因而也跌入了“伊格尔顿式”的叙事圈套中。尤其是一些对后现代主义质疑不满的人,似乎从伊格尔顿身上获得了拒斥后现代主义的充分理由,进而为自己固守传统理论模式找到理论的依据。这里的问题是,至少从理论范式转换的意义上说,如此轻易地拒斥后现代思想范式的当代理论价值,径直宣告其无效或死亡,进而为退回到传统理论范式之中欢呼喝彩,是否可以真正解决当今时代的理论危机问题?在我们看来,这无疑是一种轻率的选择。可以十分肯定地说,绕过后现代思想谱系的当代理论范式重构是无效的,其结果不是导致理论重建工作的似是而非,便是倒退到传统理论范式之中止步不前。

二、批判性谱系中的“后理论”

后现代主义尽管拒绝体系建构,缺少固定型规,延宕撒播,庞杂难辨,但其经长期的演变发展,已经显露出比较清晰的思想谱系特征。也就是说,后现代虽然是一个难以处理的复杂题域,但寻找合适的入口还是可以为它图绘出基本的理论形貌的。从理论范式上看,后现代性理论话语所主张的反本质主义、反理性主义、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反基础主义、反在场形而上学、反历史主义等极富颠覆性的理论,表达了颠覆瓦解现代性理论传统的坚定信念,张扬了激进的批判精神。

作为当代的文化思想潮流,后现代主义庞杂繁复、纷纭难辨,构成变幻莫测的思想星丛。因此,从何种立场和视域出发看待后现代思维方式或理论范式,就成为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关键所在。我们认为,从批判性的立场和视域出发,对后现代主义进行基本的理论定位,描绘其复杂多样的精神图景,勾画其家族相似的思想谱系,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后现代的理论旨趣与精神内涵。这里的问题是,如果后现代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批判性的思考方式,那么,从批判理论的视域看,“后理论”是否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具有后现代性

批判旨趣和精神的理论范式。

毋庸讳言,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始终处于尴尬的境地之中。其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固守传统理论模式的人,不仅不去仔细分辨后现代性思想谱系构成的历史复杂性,以激活其阐释当代问题的理论活力,反而将其进行时尚化、游戏化甚至妖魔化的处理,并以此消解后现代理论的批判向度。从后现代构成的历史复杂性上看,后现代主义可区分为“批判的后现代”与“时尚的后现代”两种。应该强调的是,这一区分,对于改变长期以来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误读或曲解,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对此,贝斯特和凯尔纳认为:“必须在‘游戏的’和‘反抗的’后现代话语之间作一个重要的概念上的区分[……]对抗的后现代主义是新的社会运动和反对及抵抗现存社会之冲动的产物。对抗的后现代主义强烈反对现存的社会与文化,而寻求新型的批判和反对。与现代理论和政治保持距离,对抗的后现代主义寻求新形式的抵抗、斗争和社会变化[……]作为对照,游戏的后现代主义是完全冷嘲热讽的、戏谑的和折中主义的,它提倡一种多元论的‘怎么都行’和过分的相对主义及主观主义”(《后现代转向》32)。应该看到,区分“批判的或反抗的”与“时尚的或游戏的”后现代主义,不仅有助于我们将不同性质的后现代区别对待,更有助于祛除加诸在后现代概念上的时尚化、游戏化和妖魔化的误读或曲解,以凸显后现代主义解构传统、求异创新、批判现实的理论意义。凯尔纳和贝斯特注重从批判的立场和视域来理解后现代主义,在《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的开篇,他们阐明了自己的研究立场:“我们的任务是去评估后现代理论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发展关于当前时代的批判理论与激进政治。我们将通过质疑来评判后现代理论的贡献和局限,例如,它们是否对现代性和现代理论提出了恰当的批判?是否提出了有益的后现代理论、方法、写作模式、文化批判理论以及新的后现代政治?”(“后现代理论”40)。两位学者将后现代理论纳入批判性思想谱系之中,重点考察后现代主义对当今时代的批判,指认其现代性批判的激进立场和姿态,以激活后现代理论的批判活力。他们的研究视角与方法为我们理解后现代主义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路,也规定了我们阐释“后理论”的基本理论视域,即将“后现代”与“后理论”置于怀疑批判

的思想传统之中加以理解和把握,关注其解构批判精神的当代意义与理论价值。

福柯善于将反思批判与权力统治紧密勾连在一起,在他眼里,批判的旨归就是对权力统治的抵抗,因此所谓批判也就是如何不被统治的艺术。在《什么是批判?》一文中,福柯指出:“什么是批判?记住,在哲学前沿有许多观点不断地围绕这项事业而产生、延续和重现。那些观点要么十分支持这项事业,要么极端反对它,要么借助它来发展一种尚待出现的、有望取代所有可能哲学的哲学”(388)。福柯特别强调,批判乃是贯穿西方哲学思想史的一项重要事业,它构成一种可以称之为“批判态度的历史”的理论传统。因而,可以通过许多方式来构造这种“批判态度的历史”。这一观点表明,批判作为一种理论态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应当成为审视评判思想史的基本视域和尺度。福柯始终致力于对权力的分析批判,在他看来,批判就是探寻如何不被统治的艺术。通过对权力与知识、权力与理性、权力与规训的分析、诊断和批判,福柯的批判锋芒直指现代性的权力技术运作,开创了一种与传统权力理论截然不同的后现代微观权力学。福柯发现,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权力的隐蔽与权力无孔不入的弥散同步进行,权力的运作策略和方式随之发生改变。在这一权力运作技术改变的历史过程中,理性扮演着极其特殊的角色,促使现代社会的权力规训以一种更隐蔽、更狡诈的形式运行。在现代社会理性化的策略中,权力总是以合理合法化的身份出场,权力的统治形式因而变得曲折隐蔽,或者说,权力更具欺骗性。然而,权力的隐蔽绝不意味着权力的退场,所带来的反而是权力的弥散。也就是说,权力依然无所不在、无处不有。由此构成了现代社会权力技术、权力运作和权力策略的基本内容和形式。正如福柯所言,对权力的知识考古是一种关乎“不被统治”的批判艺术。在这种批判性精神的鼓动下,福柯的现代性批判始终聚集于理性与权力,其理论旨归在于,探寻现代社会条件下人的自由如何可能。

众所周知,德里达的解构之刀异常犀利,与其一贯坚持的质疑批判精神构成内在的关联。如果说,解构主要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策略或方法,那么,批判无疑构成其内在的精神气质。德里达难以容忍任何结构的等级秩序,因为那些不言自明

的等级秩序的确立,势必使人深陷于统治的囹圄之中,因此,要改变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就不能不诉诸于批判。于是,德里达对所有的秩序权威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他敏锐地寻找隙缝,将质疑批判的刀锋切入“本体”、“逻各斯”、“在场”、“结构”、“中心”、“文本”、“语音”,促使其崩溃瓦解。德里达突破了哲学与非哲学的疆界,大胆进行边缘性的文本实验,在哲学书写过程中大量引入文学性的隐喻、转喻、换喻等文本策略,将传统哲学写作的规范性、确定性、明晰性和体系性“带到风险的边缘”,擦除掉以往设定的边界,使其展现不可能的经验,彻底改变了哲学理论的书写方式和阅读方式。在德里达看来,哲学与文学均是以文本为隐喻的一种话语实践,一种文本书写的策略。“文本之外,别无他物”,正是通过文本“延异”和“撒播”的消解策略,拆解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线性联系,颠覆了西方哲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在场的形而上学性,从而把哲学话语系统消解在无限延伸的边缘之中。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解构主义的大师,德里达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策略在思想气质上具有相通性,因此解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可以进行一种相互的增补。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德里达反复强调解构所采取的批判分析形式,正是从马克思那里继承的批判精神:“求助于某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仍然是当务之急,而且将必定是无限期地必要的”(122)。在德里达看来,解构不仅仅是一种文本的拆解,也是一种政治的批判。解构之所以是一种现实政治的批判,是由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都有赖于意识形态话语的合理合法化证明,因此,要摧毁社会等级制度的坚固结构,就必须先行解构意识形态话语,使其合理合法化的文化逻辑彻底崩解。

如前所述,“后理论”或“后现代性理论”已经构成当代文化思想中最具批判性的理论维度,成为诊断、反思、批判现代性的思想资源。后现代主义采取延异、增补、播撒、踪迹的解构策略,以批判在场的形而上学;后现代主义倡导拒斥宏大叙事的语言游戏,以批判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后现代主义标举非同一的否定性思维,以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同一性哲学;后现代主义凸显文化政治的现实关切,以批判先验决定论的历史主义,从而

生成出与现代性理论范式截然不同的一种新的或“后”的理论范式。

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重构,不仅仅是当代文化发展变化的一种回应,它更是一种批判性的质疑。因此,如何在后理论时代重构文学理论,进而测绘当代文化地图的形貌,成为极具现实关切和批判向度的文化政治议题。在我们看来,摆脱传统理论模式的框限是理论重构的前提性工作,当代文学理论重构必须建立在新的理论范式基础上,批判性后现代主义能够担当这一理论重构的艰巨任务。从此意义上说,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重构如何可能的问题,实质上也就是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批判性理论重构如何可能的问题。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Derrida, Jacques. *Specters of Marx*. Trans. He Yi.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1999.]

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Eagleton, Terry. *After Theory*. Trans. Shang Zhe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9.]

福柯:“什么是批判?”,《启蒙运动与现代性》,詹姆斯·施密特编,徐向东 卢华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Foucault, Michael. “What is Critique?” *What is Enlightenment? Eighteenth Century Answers and Twentieth - Century Questions*. Ed. James Schmidt. Trans. Xu Xiangdong and Lu Huapi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5.]

凯尔纳 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质疑》,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Kellner, Douglas, and Steven Best. *Postmodern Theory: Critical Interrogations*. Trans. Zhang Zhibin.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2001.]

——:《后现代转向》,陈刚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 *The Postmodern Turn*. Trans. Chen Gang, et al.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拉曼·赛尔登等:《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Selden, Raman, et al.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Trans. Liu Xiangyu.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责任编辑:王嘉军)